



第二辑 (2013)

比较政治评论

Review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杨光斌 主编

民主与政体

曾 毅 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与政体理论的简单化：“民主—非民主”二元对立政体观的知识社会学
亨利·E.黑尔 混合政体：当民主和独裁混合时

民主与国家建设—国家治理

杨光斌 李楠龙 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另一种关系：比较历史的视野
谈火生 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化

民主与国家转型

白 霖 民主的多重路径
杨光斌 杨洪晓 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辑 (2013)

比较政治评论

Review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杨光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评论. 第2辑 / 杨光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733 - 8

I. ①比… II. ①杨… III. ①比较政治学—文集 IV. ①D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0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的话

民主在各国、甚至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到底居何种地位，依然是值得深究的疑问；但是，民主观念在中国的宰制性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鉴于这种现实与观念的反差，我们特别组织民主研究专辑，深入讨论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又似是而非的民主问题，期待能提出异于流行观念的洞见。

我们已经太习惯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给国家定位定性，这实在有违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这种简单的常识。在政体理论体系上，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展和国家结构的复杂化，政体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的以统治者人数标准演变为如何建立统治机构（总统制—议会制），再从单纯的中央层面的政体理论演进到中央—地方关系的联邦制，更别说现代资本权力是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就是面对这样越来越复杂化的国家结构，即事实上的混合政体性质，政体理论却越来越简单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分法。二分法是怎么来的？曾毅博士的长文《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与政体理论的简单化：“民主—非民主”二元对立政体观知识社会学》给予了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耐心读完这篇文章的人或许不会再简单地用二分法定位一个国家了——除非政治上的特别需要。与此文相呼应，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黑尔的文章指出，很多转型国家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而是混合制，而且混合制并非过渡时。这种研究应该属于真正的政治科学而非二分法的意识形态宣示。

似是而非的重大问题不但有政体二分法，还有公民社会与民主的格式化认识。在国内学术界，几乎可以这样说，有多少项研究，就有多少对公民社会与民主正向关系的肯定，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在学术意义而非政治层面，这是不严肃的。因为国际社会科学早有研究表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社会，意大利南部的公民社会也与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治理无缘，印度的公民社会很发达但治理很成问题。比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恰恰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不同公民社会的“民情”决定着一国民主政治

的质量，这是杨光斌教授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另一种关系：比较历史的视野》的理论发现。与此文相呼应，谈火生副教授关于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研究同样具有原创性，他发现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并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更别说发挥转型作用——而这正是国内外学术界在谈到民主转型时所津津乐道的。

本辑的第3个专题是民主与民族性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霖长期关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底层社会变迁研究，在《民主的多重路径》中，他同样以相关国家的与生俱来的本土性民主要素比如“自由”的多少来观察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路径，发现这些国家均存在不同于西方民主理论的“原发性民主”。白霖教授还特别强调：“大多数人经常想从多种价值和观念之间、而不是从制度和现代过程之中探寻民主政治的根源。”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同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标准答案，发人深思。在民主与民族性—民族主义的维度上，杨光斌和杨洪晓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揭示了，当民主遭遇民族主义时，其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把民主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大纲，但也应该是有益的新路径。

本辑的学术综论特别值得一提。中国人都在呼唤民主，但是民主研究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李月军副研究员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历史制度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都是重要的研究范式，作者的梳理和提炼对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专业读者将能体会到我们编辑此刊的艰难和用心。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提供学科知识和学术思想的增长点，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杨光斌

2013年10月15日

比较政治评论

主编的话 杨光斌 (1)

专题论文(1):民主与政体

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与政体理论的简单化

——“民主—非民主”二元对立政体观的知识社会学 曾 毅 (1)

混合政体:当民主和独裁混合时 亨利·E. 黑尔 (47)

专题论文(2):民主与国家建设—国家治理

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另一种关系

——比较历史的视野 杨光斌 李楠龙 (66)

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化 谈火生 (94)

专题论文(3):民主与国家转型

民主的多重路径 白 霖 (118)

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 杨光斌 杨洪晓 (132)

学术综论

审思、祛魅与重构:中国学术界的民主理论研究	李月军	(148)
历史制度主义:瓶颈与展望	黄 晨 周宇翔	(164)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范式	卫知唤	(178)

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与政体理论的简单化^{*}

——“民主—非民主”二元对立政体观的知识社会学

曾 毅^{**}

摘 要 我们所处的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但是描述国家性质的政体理论却越来越简单化，比如流行的“民主—非民主”二分法政体观。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研究发现，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和以此相适应的社会科学二分法直接催生了二元对立政体观。但是，自由民主理论家所讲的民主即竞争性选举，其实只不过是政体的一个变量而已。把竞争性选举与民主政体画等号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难以逾越的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

关键词 政体 民主 威权 二分法

与古城邦和中世纪政治甚至近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结构具有无比的复杂性。然而与此相对应，描述国家性质的理论即政体理论却更加简单化，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主—非民主或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政体观。而事实上，古希腊城邦有亚里士多德说的混合制，到了近代，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其实已经是典型的混合制，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美国的制度创新更在于处理纵向权力关系的联邦制以及横向权力关系的三权分立，是一种复合共和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政体理论如果没有资本权力的一席之地，这样的政体理论本身就没有多少意义。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问题在于，这样能真实地反映政治社会结构的混合政体理论，怎么变成了无比简单化的民主制或自由民主制？与此相对应，对手就是非民主的专制、威权。

^{*} 本文是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

^{**} 曾毅，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政治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走到今天，非常有必要在知识社会学脉络上厘清这些已经变成流行观念的政治概念。“民主—非民主”二元政体观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化的思维方式更是强化着政体的敌对性区隔。为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至今仍在流行的二元对立的政体观，本文将首先梳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历史语境、社会科学二分法，然后看看我们所熟悉的民主理论家们是如何对政体进行二分法界定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其号称的“科学化”。为此，本文还将考察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如何在“科学范式”的努力中试图将自己国家的政体普世化，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最高成就的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其实背后是一种普世化的政体观。

一 西方国家的新挑战与政治学的新语境：“两极” 世界格局下的二分法社会科学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政治学界关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性质的认识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科学方法、学科交叉，停留在“科学性”那里；^①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到行为主义政治学中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但是没有深入讨论，只是点到为止；^②第三个层次是明确论证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包裹下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但是没有认识到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性成就的研究路径即理性选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范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③这样，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当今的国内外学者虽然承认了“价值”的重要性，但“价值”都被掩藏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化努力中，以至于当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时，他们都已经有了一个前提性的“历史的终结”的假设，即非西方国家的故事哪些符合既有的模式、理论，符合者则被认为是朝着正确方向走，否则就是走向错误的方向。因此，严格地说，“祛价值”依然是很多西方学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追求。事实上，西方的价值很多都被包装在科学主义方法、科学化的范式之中。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回到当时社会科学家们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使命感（mission）。

一般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起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即以研究国家、政府为主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对“大危机”束手无策时，被迫转向政府之外的力

① 比如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比如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比如张飞岸《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

量即个人与社会的研究，以研究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为主旨的戴维·杜鲁门的《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正式诞生。^① 其实，这只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所谓的科学性的一面，即以学科交叉、个体分析、数据处理为方法的关于政府之外的政治行为的研究。但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来自何方？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回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起点。

让我们做这样的假设：你是身处这样一个大转型的宏大历史场景中的西方学者。你所面临的时代环境波诡云谲：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经济大危机，并导致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与资本主义国家联手战胜了法西斯政权；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平等主义因为女性和黑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达到新的高潮，经济上普遍流行战争遗产即计划和国家干预，一改二战前的放任经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社会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替代性制度。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主导性观念会是什么？

在二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熊彼特已经大胆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存在下去了，因为其内部结构中存在固有的“创造性破坏”^②。那么，“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③。到了1949年，熊彼特更是大胆放言，世界将“大步进入社会主义”——虽然美国人十分不喜欢这个词，时常用另外一个词如“自由主义”来代替它，^④并将这个题目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三版的首篇。

熊彼特“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趋向于毁灭其本身，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则可能是其继承人。^⑤ 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⑥ 显然，这已经不是想象，而是事实陈述，不但苏联有了多年的这样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正在欧洲蔓延，新兴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都是这样的制度。

熊彼特不但描述了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现状，还深刻地分析了来自理性解放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最终因为不停滞的理性解放而解构着资本主义

① 参见〔美〕戴维·杜鲁门《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147页。

③ 同上书，第257页。

④ 同上书，第28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25页。

的内部结构。可见，熊彼特的分析事实上代表着一种信仰危机，即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信仰危机——事实上，这种信仰危机即西方知识界左倾化在二次大战之间已经开始了。

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不少新兴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普世性追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敌对双方都展开了民主话语的抢夺。不仅如此，由对于民主理论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建设之争。中国革命以及后来新兴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是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的一个分水岭，即民主理论转化成为建设民主制国家问题，新兴国家都标榜自己是民主共和国或民主政体，即使其实际的民主化程度可能名不符实。^① 这样，民主与国家建设成为密不可分的概念，民主自然就成为一个普世性追求。

在这种背景下，捍卫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怎么办？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功能就有了用武之地。

要保住西方的传统地盘、抵御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美国就必须放弃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转而实行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机会来了。战后英国没有能力再向传统盟友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为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要让国会同意美国接过英国的接力棒，就必须让国会议员们感到迫切的威胁。于是就有了标志着冷战诞生的杜鲁门的著名演讲。^② 有学者这样评价意识形态与冷战的关系：“杜鲁门主义显然夸大了美国面临的威胁，把与苏联的冲突宗教化，因此改变了冷战的性质，但却有利动员国会和民众对其政策大转变的支持。应该说，当战后美国历届总统谈论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事实上他们不但把挑战共产主义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同时也通过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动员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③

既然美国的政治环境即国际冲突有了宗教色彩和意识形态性质，反过来也必然会影响着国内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事实上，在经济上，美国著名的“军工利益复合体”就是冷战的产物。那么，作为文化的学术和思想活动呢？也必然围绕冷战这一主线展开，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197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把韦伯视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源泉，韦伯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方法论上的二元化分类，即著名的工具理

① “民主”，见《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②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发表演说，阐述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观点：美国的政策必须是去支持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和外来势力征服的图谋；美国必须援助自由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设计他们的命运；美国的帮助应该主要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而实现该地区的经济稳定和政治有序。

③ 杨光斌：《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性与价值理性（即事实与价值）。^① 这种方法论上的二元概念也处处体现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② 彻底确立韦伯在美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统领地位的则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的奠定结构主义基础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系统论证了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人，^③ 这显然是不符合知识论常识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建构。到了1951年，帕森斯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一般性理论”，他确信社会可以通过一系列对立的二分体模式变量来理解。这些模式变量包括：先赋性质/成就表现；情感/非情感；集体取向/自我取向；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扩散性/专门性。随着变量模式用法的演变，位于二分结构两端的项目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情感、集体取向和特殊主义在内部逻辑上被认为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制约的；人类导向也就成了集体义务导向并同时关注特别的人和客体而不是一般原则等。^④ 非情感、自我取向、普遍主义也同样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模式变量的二分结构为人们理解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框架：“增长”和“发展”的进程意味着从二分结构的一端发展到了另外一端。这个框架的意识形态模式强制社会向一个必然的未来前进。历史发展只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康庄大道，而另外一条是死胡同。没有人能够驾驭历史进程。帕森斯及其同事认为这个理论非常完善，因为它解释了所有可能的行为组合，所以他们很有信心：“我们认为只存在五种基本的模式变量，他们是理论推演所能得到的全部变量，在此意义上，这些变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⑤

帕森斯和希尔斯还打算创造一个更简洁的统一性理论。帕森斯于1954年在哈佛大学行为主义学术委员会上说：“学术活动的一个长期计划目标的实现——形成一个统领行为主义科学所有领域的统一理论——已指日可待。”^⑥ 因为系统的各个元素是系统相关的，所以这个系统不会被部分瓦解而只能被整体抛弃。社会行动者过去曾经可以从变量的对立面提取元素然后进行混合和搭配从而创造出新的混合体。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却并没有为社会行动者提供这种可能性。不存在混合状态。如果社会行动者或者机构将一些特征混合，结果将是向业已决定了的未来“变迁”或者是失败。实际上韦伯已经为这一理论框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美]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④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77.

⑤ Parsons and Shils (fn. 14), p. 77.

⑥ Report by the Faculty Committee,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Harv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54), p. 114.

架奠定了基础，他推测了一个宿命的消极的东方，而这也恰恰隐藏在帕森斯式的现代化理论背后。

韦伯的二分法理论将文明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类：在一类文明中，人类是上帝的工具；在另一类文明中，人类是上帝的一部分。这其中一种是伦理性宗教，导向现世的禁欲主义并伴随着重塑世界的紧迫性；另一种是模范性宗教，导向来世的禁欲主义，避免行动并接受现存的秩序，即宿命论。

这就是冷战初期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政治现实，在社会科学上则体现为“没有中间地带”的二分法和同样的二元对立。这种非白即黑的二分显然不符合现实世界，组成现代性的各种类别不是按照帕森斯和韦伯所想是系统的或有机相关的。为此，历来不乏对事实—价值二分法的有力评判者。在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看来，科学的事实判断并非与价值无关，而伦理性的价值判断也包含着事实因素；科学与伦理学、事实与价值实际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冷战的环境下，杜威等人的这些真知灼见也只能存在于纯粹的学术中，政治上没有容身之地。只有理解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和统领性的学术范式，才能更好地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科学化努力，尤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关于政体的意识形态本质。

二 西方政治学的新方向：行为主义的“一般理论”与“范式”追求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般特征，比如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统计方法、学科交叉以及“祛价值化”，这些特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帕森斯说的“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以解释所有的政治现象，而“一般理论”的最高形式就是所谓的学科范式。

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范式”概念，尽管国内学术界都在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甚至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使用“范式”。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使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大为流行。库恩在该部著作中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科学观念。在库恩看来，科学不再是僵化的、生硬的知识体系，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探索过程，人的实践活动。具体而言，构成科学事业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是库恩反复强调的科学共同体，亦即科学不是理性的自我扩张，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具体行动；第二，是科学活动的工具（包括思想工具的“范式”和物质工具）；第三，则是科学的目标——客观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并不是以浩瀚无边的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戴着“范式”这个眼镜去探索世界的。这三者的结合可以称为科学的“三体运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

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①

我们常说的范式是指“某些实际科学实验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②。范式包括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它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③。

范式对于科学共同体有什么意义呢？库恩特别指出，研究范式，是为那些“以后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④。这样的一致性前提可以避免分歧，达成共识，使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们共享相同的研究基础。这样的“统一思路”有助于提高效率，使科学研究向着更深远的方向进行。因此，一个科学共同体遵守同样的范式，通过教科书、实验室的传授和强化，范式得以巩固。这里的范式，是观察自然界的眼镜和路径，因此必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有选择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这种“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眼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现有能力和方法，即“范式”。科学探索从来不是随心所欲在空白里翱翔，而是基于已有知识的圆圈逐步扩展的过程。范式和科学，带有很大的主观选择意味和主观能动性。

进一步地讲，科学不仅是主观的，甚至说是带有偏见的。有时候，科学和信仰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库恩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这些因信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⑤。库恩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发现早期科学发展阶段，对自然界的解释存在种种流派的对立。而这些分歧最后会渐渐消失，被其中之一学派“一统天下”。这一学派的胜利并不必然是因为它更好地解释自然实在，而更可能是在于“它的自身特征性的信念与成见，总是只强调那个庞大的而又不发达的信息

① 纪树立：《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3期。

② 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⑤ 同上书，第22页。

库中的某一特定部分”^①。换言之，范式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偏执、更坚定。

这也就是说，范式是一种人的主观思维活动，带有人的情感、偏见和信念。正如库恩自己所说：“在一段确定的时间内，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之诸组成成分中，总是有一种明显的随意因素，其中包含着个人与历史的偶然因素在内。”^②

库恩的“范式”理论由于对科学史观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影响，“范式”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争相使用。虽然他的理论几乎只关注自然科学，但用美国批判理论学者伯恩斯坦的话来讲，“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了库恩”^③。如果自然科学的“科学”都带有非科学、主观因素，那么以改造社会和解释社会的社会科学又如何呢？

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不久，先后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政治学家杜鲁门和阿尔蒙德就分别在就任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引用库恩的概念，用以替当时的行为革命辩护，试图证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杜鲁门在演讲中推崇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范式是整合学科、达成研究共识、推动研究深化的基础。可惜的是，美国政治科学自形成伊始，便缺乏这种精确的范式。他写道：“在美国政治科学形成初期，也就是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并不存在一个范式，后来也没有。毫无疑问，这种统一研究模式的缺乏，影响了政治学发展的步伐和形式，因为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精确性。……虽然如此，我想确切说来，至少从1880年至1930年的半个世纪，美国政治科学中却有某种类似范式的东西存在。为了不扭曲库恩那深具启发性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类似范式的东西，只是对于政治科学要做什么、如何去做的一种模糊的、宽泛的共识。因为大家达成的共识很模糊，使用的术语既宽松又不精确，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质量和内涵上参差不齐。”^④不过，杜鲁门仍旧把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科学视为一种自觉，开始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意识，这就是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科学学科共识却趋于瓦解，这是由于

① 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美] 理查德·J. 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琪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④ David B. Truman, “Disillu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a Discipl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4 (1965), p. 866.

世界政治的两个发展：“其一是波茨坦宣言后急剧改变的世界政治”，这就需要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系统思考，这是如今政治科学家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则是“殖民体制的崩解、新兴国家或国家实体的出现，以及古老国家的觉醒，彰显出当今政治科学不足：一是研究范围有限；二是把（本国的）政治体系性质视为理所当然；三是缺少对政治变迁的明确观点”^①。也就是说，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新形势需要美国政治学者研究新的议题，最重要的两个关注，就是新的国际力量格局（特别是冷战）以及对新兴殖民国家道路选择的研究，而这两个都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

怎么办？如何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当时松散、模糊的共识状况，在“研究什么、如何推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催生政治科学的范式呢？杜鲁门认为，应该达成学科自觉，避免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程序上扩大分歧。具体来讲，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有这么几点契机有助于形成新的共识和范式：

首先，对政治制度研究的热情重燃。杜鲁门认为，政治制度研究是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研究议题，如果美国政治科学要重新整合学科，形成新的范式，政治制度研究是绕不开的、最好的、最包容的议题。对国际政治制度、一国政治制度和国内次级政治制度的研究虽然各不相同，但还是存在相通之处的，这有利于重新找回学科共识，通过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使那些五花八门的流派自行瓦解。

杜鲁门写道：“最后，对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的认真研究必然会诉诸概念重塑（reconceptualization），以及制度间比较的新的话语体系。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批准设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之日起，这种政治制度研究的概念重塑就列入日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使命看似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过更大的任务其实是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这个框架共享研究变量和属性，而不论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如何。”^②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以“概念重塑”为路径试图达到的学科抱负是多么宏伟：杜鲁门这里说得明白无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对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是打算将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来，并且摒弃了客观分析的基础——尊重该国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杜鲁门坦率地揭示了当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寻求统一研究框架，而非尊重客观事实。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执的性格，如

① David B. Truman, “Disillu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a Discipl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4 (1965), p. 868.

② Ibid., p. 870.

果非要给其一个定位，那就是政治科学包裹中的意识形态。

其次，理论的复兴。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并不是在讨论政治思想的经典历史文献的分析和解释，我说的是另一种理论。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的不断成长且富有成效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包括研究人员意识到的，除了使用理论他们是别无其他选择的，还包括认识到事实自己从来不会说话，除非通过研究人员的假设和概念来控制他们的选择和分析，还包括研究人员要明白，自己的研究结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模糊的、自相矛盾的、不充分的理论，要么是明确的、逻辑自洽的、有理有据的理论”^①。总而言之，基于数据建构严密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科学）方法论至上主义。行为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在事实和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对行为主义学者来说，阐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并非其目的；分析单个的事件或过程是为了证实科学的法则或统计学的规律”^②；“对政治现象进行科学的考察必须以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平衡为方法论基础。没有数据的理论主张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根基或现实意义”^③。

最后，学术界再次乐于致力于“科学”目标的氛围。杜鲁门认为，对“科学性”的要求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政治学者都乐于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不过，对于科学的本性该如何看待呢？什么是科学？杜鲁门说：“（科学）并不保证每一个结论的真实性，也不保证完全摒弃偏见（例如研究人员的价值观）。科学，并不意味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将可冠以‘常识’的知识和信念与声称是‘科学’的知识截然分开。科学也不确保只有知识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学科的一部分。”^④杜鲁门将当时学者们对这种广义上“科学”的热衷视为政治科学达成共识的一个契机。怀着一种建立政治科学范式和学科共识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杜鲁门指出：

“一种基于广义上科学共同体和上述我所说的两个趋势（作者按：即对制度和理论的复兴）的、关于这个学科该向何处去的新的共识，可能会带来政治学的新的发展和进步。库恩的观点与此有些关联，带给我们的启发是：这种发展和相关预期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频繁争论。‘某领域如何才能滚滚向前？’这个问题比‘它是科学的吗？’更根本。库恩如是

① David B. Truman, "Disillu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a Discipl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4 (1965), p. 870.

②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

④ David B. Truman, "Disillu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a Discipl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4 (1965), p. 872.